

以“华侨史观”开启中国史观与全球史观的结合

——简评梁启超关于华侨华人的研究

程 希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华侨史研究的开创者。其开创意义不仅在于对当下“华侨史”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中“专门史”研究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大致奠定了沿用至今的关于华侨华人研究的主要探讨方向和考察视角。更重要的是，他着眼于“中华民族”强盛和中国国力发展而形成的“华侨史观”，即华侨华人的跨国商贸和移民活动是有助于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支持力量，不仅启发了通过华侨史溯源反观隋唐以后中国各朝代兴衰的研究思路，即考察中国的对外商贸活动对社会变革的影响，而且对通过华侨史研究将中国史与区域国别史和全球史（世界史），以及与文明史或物质文化史相结合的考察，有着重要的学术探讨意义和研究拓展价值。

关键词：梁启超；华侨史；全球史

作者程希，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研究方向：华侨史与中国近现代史。地址：北京市，邮编100007。

一、前言

梁启超出生于“盛产”华侨华人的中国著名传统侨乡——广东“四邑”^①之一的新会，但他本人与华侨华人产生直接关联和多种重大交集，却是因晚清政治变局所迫。1898年10月，戊戌变法失败后，时年26岁的梁启超流亡日本，开始了长达14年在海外旅居和游历的生活。他为世人所熟知的在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简称“海外侨社”）的活动，多为其坚持改良维新的政治主张而从事的保皇派势力扩张和向华侨华人募捐筹款，乃至策动和组织华侨华人支持、参与国内的武装起义等，而他本人因为长达十余年在海外的生活和工作而具有了名副其实的“华侨”这一身份却被忽略了。

明清两代，在中国当时统治者的眼中，华侨华人或被视为“化外之民”“天朝弃民”乃至“挟洋自重”的逆贼，或可被利用为与洋夷周旋角力的缓冲和工具。梁启超通过在海外十余年的工作、生活和游历，不仅对海外侨社有了耳闻目睹的亲身体验，而且对华侨华人的处境和地位，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和对中外交涉的影响，都有了更全面的思考和更深入的认识，其通过书信游记、政论建议、人物传记等留下的诸多华侨华人研

^①通常指广东新会、台山、开平和恩平四地。也有“五邑”一说，即在“四邑”之外再加上相邻的鹤山。在中国近代史上，“五邑”地区以出洋，特别是前往美洲的人数众多而成为著名“侨乡”。

究文献资料,不仅是开创中国华侨史研究的奠基之作,而且对后世华侨华人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在全球史观、区域国别史研究盛行以及华侨华人研究在中国大陆已纷纷被纳入“国际关系”研究的当下,其关于华侨史的开创性研究仍然是值得回顾和反思的。

梁启超关于华侨史的研究,主要以其华侨史观对民国时期的一些学者产生了较大影响,如胡绍南、易本羲、温雄飞等人。此后,基本上处于销声匿迹、无人问津的状态。进入21世纪以后,李安山的《明清时期有关华侨华人的典籍笔记和研究概述》^①一文,首先明确肯定了梁启超对于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开创性地位,如《记华工禁约》(1904年)和《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1905年)均是其开创性研究的代表作。又十年后,王亚生、刘劲松发表的《略论梁启超华侨华人研究之成就》^②一文,同样肯定了梁启超在华侨史研究方面的开创性成就,但认为梁启超的《致伍秩庸星使书》(1897年)、《夏威夷游记》(1899年)或陈兰彬主持撰写的调查报告《古巴华工事务各节》(1874年)应是“中国华侨研究的首创之作”,并从“美国禁华问题”“华人华侨史”“华人华侨经济状况”“华人华侨社会组织”四个方面对梁启超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述评。庄国土的《论清代华侨与海外保皇派》^③一文述及了梁启超在北美发展保皇会组织得到踊跃支持的盛况,以及其在海外所办华侨学校和华文报刊在启迪民智、影响时局和获得海外侨社上层人士拥戴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反映出梁启超作为保皇派领导人之一对于海外侨社力量的培养和争取,但关于梁启超对当时华侨华人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和考量,并未被纳入论题范围内。

由于本文的出发点主要是从华侨华人的起源和历史来思考这一群体对于中国的意义,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演变,因而,不少学者从海洋商贸和经济活动的角度对于东南亚华侨史的论述和分析,还是使得本文一些问题和看法的提出,受到了有益的启发。如石坚平的《东南亚华人网络与早期中英贸易的发展》^④,黄素芳的《明代东南沿海闽粤人移民泰国的历史考察》^⑤,郭梁(李国梁)的《关于华侨华人经济研究的几个问题》^⑥以及《再谈华侨华人经济研究的几个问题》^⑦,等等。

本文再次揭示和强调了梁启超关注和考察华侨华人问题的两个视角:华侨华人这一群体本身在海外的处境及其对于中外关系、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意义,并认为回顾和思考梁启超对于华侨史研究的开创,有助于重新认识华侨史的起源,即起源于自古以来,特别是隋唐以后中国的对外商贸活动,以及这一活动对中国史、东南亚史、全球史演变或发展进程的影响,如大量白银流入导致的自明朝以后银本位制的形成及其引发的朝代兴衰更迭和社会变革,中国东南沿海始终未曾禁绝的民间海洋商贸活动对大航海时代来临和经济全球化的催生与促进,以及中国民间商贸力量对东南亚地区早期开发、建设乃至今日政治、经济格局之形成所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等等。基于华侨史研究中这些深入研究还远远不足甚至尚未被涉及或意识到的层面,本文认为以华侨史研究为切入点,将中国史与区域国别史和全球史(世界史),以及与文明史或物质文化史的相关考察有机结合,有着重要的研究启发意义和学术拓展价值。

二、梁启超开创华侨华人研究的缘起

华侨华人在海外的处境,特别是中国移民因美国《排华法案》而遭受的严苛和不公正对待,是梁启超关注华侨华人问题的缘起。

①李安山:《明清时期有关华侨华人的典籍笔记和研究概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②王亚生、刘劲松:《略论梁启超华侨华人研究之成就》,《前沿》2012年第18期。

③庄国土:《论清代华侨与海外保皇派》,《八桂侨刊》2012年第2期。

④石坚平:《东南亚华人网络与早期中英贸易的发展》,《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⑤黄素芳:《明代东南沿海闽粤人移民泰国的历史考察》,《八桂侨刊》2010年第4期。

⑥郭梁:《关于华侨华人经济研究的几个问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

⑦李国梁:《再谈华侨华人经济研究的几个问题》,《八桂侨刊》2013年第1期。

19世纪中叶大量中国人进入美国,从事淘金、修建铁路以及农业种植等,由于与底层白人劳工的经济利益及宗教文化冲突,很快受到一些美国白人劳工组织的种族歧视和暴力驱逐。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正式以法律形式对中国移民进行各种限制和排斥。在了解到中国移民因《排华法案》而遭受的严苛和不公正对待后,梁启超致书时任驻美大使伍廷芳,即1897年《致伍秩庸星使书》,从美国下层白人劳工的利益之争以及赴美华工自身素质低下两方面分析了美国《排华法案》实施的缘由,并提出“立孔庙”“兴书院”“设报馆”“联公会”“劝工艺”等改良海外侨社文化习俗、提高华工文明素质的具体建议^①,希望以此增进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侨华人的认可和接纳。

1903年5月至12月,梁启超在美国华侨华人的接洽安排下赴美国访问考察,受到了华侨华人众星捧月般的拥戴,演说受到热烈欢迎,所到之处维新会(英文名 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 又称“保皇会”“保商会”)组织应声扩张,同时他对在美华侨华人受到的歧视和排斥也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和认识。正因如此,尽管他访美时也受到了美国政、商、新闻、宗教界的隆重礼遇,甚至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与国务卿约翰·海伊(John Hay)都分别会见了,对他的政治主张和社会活动表示赞赏与支持,但他始终是基于中国立场和民族情怀来看待美国和华侨华人的。因而当他感受到美国经济繁荣和国力日益崛起时,既心生赞叹羡慕,也对其商业和资本的扩张终将波及和危害中国的态势进行了前瞻和预警,对华侨华人因美国《排华法案》遭受的苛待和华工自身素质的低下也表达了强烈的愤慨和忧虑。

梁启超这些访美的观感和见解发表于其根据游历北美时的日记,于1904年2月整理出版的《新大陆游记》一书(新民丛报社增刊本),而其中被视为华侨史研究重要奠基之作的,是作为该书附录一的《记华工禁约》^②。同年6月,该附录以单行本出版,书名改为《美国华工禁约记》。《记华工禁约》是最早针对美国排华政策进行的专门论述,通篇简明扼要但直击要害,反映出在游历的过程中,他对美国华侨华人生存状态的关注,这种关注同时也是他对自己国家和国民的再认识与考察。在该书中,他从美国经济发展角度全面阐述了美国因西部开发大肆招揽华工,华工与部分欧洲移民,以及排华政策与民主、共和两党党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强调了华侨华人在美国西部开发中所作的贡献。同时,他采用美国人口统计数据,指出了在美华侨华人有约三分之二聚居于西部地区,招致西部白人排华情绪更为强烈的冲突背景,分析了由于美国《排华法案》的实施,导致中国移民与欧洲移民此消彼长的情况,揭露了美国利用清政府不懂外交而在移民和出入境政策方面对中国采取的欺诈手段,通过对美国有关中国移民政策变化的梳理,逐条批驳了《排华法案》的内容,列举了美国移民当局苛刻欺凌中国移民的情形,严厉谴责了美国排华使中国人受到的种种伤害,并从国际法角度提出可以采取外交手段保护中国移民合法权益的见解。

1905年5月,因美国要求续签《中美会订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中美双方在北京举行续签谈判。由于该条款实际是《排华法案》的补充延伸,中国民众的反美情绪因此高涨。在中国工商业界的组织发动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在全国爆发并波及海外。为支持这一运动,梁启超立即着手撰写了《抵制禁约与中美国交之关系》一文^③,对通过外交手段抵制美国排华政策进行了充分阐述。梁启超指出,美国的《排华法案》违反了此前中美双方所签条约中规定的“最优待国”待遇原则,因而中国有权对美国的《排华法案》提出反对。同时,他又从国际法和国内法角度阐述了抵制美货运动合法性,建议中国采取强硬态度,通过在中美贸易上对美国实施制裁,即抵制美货,迫使美国改变针对中国人的移民政策。梁启超还向海外各地的维新会发出《致各埠列位同志义兄弟书》^④的公开电,号召筹款支持国内罢市罢工,以上海

①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九集·函电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66—470页。

②参见《梁启超全集(第十七集·诗文)》,第232—257页。

③原载于《新民丛报》第68号,1905年5月4日出版。参见《梁启超全集(第五集·论著五)》,第103—106页。

④参见方志钦编:《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香港:银河出版社,2008年,第112—127页。

和香港为抵制美货主要阵地与美国展开坚决斗争,从而迫使美国政府对该条款作出有利于华侨华人的修改。受此公开电鼓舞,各地维新会组织华侨华人联名上书清廷,恳请勿与美国续签禁约,同时将维新会关于抵制美货的七项决议发往中国各大城市,并积极筹款对国人和海外华侨华人共同抵制美货给予了大量资金支持,将抵制美货运动迅速在海内外推向高潮,最终迫使美国放宽了对于中国人出入境的有关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华侨华人在美国的待遇,特别是迫使美国承诺今后有关华侨华人政策的修改,需经中美两国政府协商一致,并保障华侨华人在美应享的权益和服务及申诉权;此外,还迫使美国初步同意退还部分庚子赔款。

抵制美货运动是维新派对华侨华人进行政治、经济动员和组织的又一次高潮,也是梁启超为维护华侨华人利益而切实付诸行动的又一次努力,反映了他对于支持华侨华人在海外发展可使中国获益的一贯思考和认识。

三、“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与华侨史观的开启

与梁启超希望通过变法维新使中国走上复兴强国之路的政治追求一致,除了华侨华人在海外的处境,梁启超对华侨华人的关注,更主要是从中国的国力发展和国际竞争着眼的。从中西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对比中,他逐步形成了对于“中华民族”的认识,成为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首倡者。他将“中华民族”的特征概括为:“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此复杂巩固之民族,乃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此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①。他还清醒地意识到,要从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来考量“中华民族”的未来。

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②一文中,他指出弱肉强食是帝国主义扩张的本性,国际竞争主要在于国际资源和国际商贸的竞争。他对比了外国人在中国和外国人在中国的人数及开办的商店数,认为所谓殖民事业的成功并不在于居住他国人数的多寡,而在于在他国商贸活动的兴盛和能够享有的“优等之权利”^③。在该文中,他还认为列强在亚洲的殖民竞争重点已由印度转为中国,目标依然是争夺资源和市场;但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不仅中国移民在欧美国家及其殖民地受到了歧视苛待或排斥限制,而且中国本身也正在遭受列强的蚕食瓜分。梁启超希望通过“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来整合构建现代中国,来探索一条救国之路。

“中华民族”概念的诞生反映出梁启超自身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的觉醒和新的思想高度,也为中国的多民族融合与现代化转型奠定了共识基础。这是梁启超一生最有意义的政治活动和学术研究成果。在其对于这一概念的不断思考和明确过程中,华侨不仅被纳入了“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而且还被他寄予了厚望。如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这篇文章中,他还以中国移居新马一带的先驱人物叶亚来为例,认为中国人在东南亚的开拓经营能力并不弱于欧洲列强,只是因为欧洲殖民者有政府为后援,而中国人的海外开拓和商贸活动则是受到本国政府打压,所以才丧失了东南亚已获得的优势^④。因而,他早在1899年发表的《论商业会议所之益》《商会议》《论内地杂居与商务关系》三篇,就提出了对于扶助华侨事业方面的初步主张。

从研究内容看,梁启超的华侨史研究还涉及了华侨华人社团组织,包括秘密会社,以及华侨华人的经济活动和华侨华人涉及的中外交涉(国际法)问题。如关于华侨华人社团组织的考察研究,梁启超在《海外殖民调查报告(一)》专门对英属哥伦比亚省维新会的情况,特别是对其选举及运作过程进行了介绍,认为

①引自“中国新民:梁启超诞辰150周年纪念展览”,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2023年11月23日至2024年2月20日。

②原载于《新民丛报》第二、三、四、五号,1902年2月22日至4月8日出版。参见《梁启超全集(第二集·论著二)》,第692—712页

③《梁启超全集(第二集·论著二)》,第707页。

④《梁启超全集(第二集·论著二)》,第700页。

“俨然与文明国之政党无异,此诚中国数千年所未有也。”^①在《新大陆游记(节录)》“砵仑(即波特兰)至旧金山”行程记述的第三十九节^②中,他又对美国华侨华人社团组织进行了分类研究,揭示了其内部运作情况,评价了其社会影响。总体而言,他认为华侨华人社团组织显示出海外侨社帮派众多、山头林立,且时有利益纠葛和矛盾争斗,是华侨华人不能有效团结力量,也不利于形成共同民族、国家意识的表现。

关于华侨华人的经济活动,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节录)》“砵仑至旧金山”第三十八节中对美国华侨华人所从事的职业按“工业”“商业”“杂业”三大类、十七个行业及无业者作了较为全面细致的梳理、估算,对三大类中从事各种具体职业的华侨华人数量及其分布和收入情况进行了描述和分析,称其时在美国中国人总数约有12万,但华工在美国从事采矿和修建铁路的盛况已去,指出中国人虽然有着较强的经商能力,但其海外商业经营局限于华侨华人社会,尤以洗衣业、渔业、农业、餐饮业和零售业从业者居多,鲜有从事大宗国际贸易者。他还对华侨华人在当地谋生普遍不易,却盛行赌博的恶习表达了不满^③。这些考察报告或游记,反映出梁启超对当时华侨华人境况的持续和全面关注,也为后世华侨史相关问题的研究留下了殊为难得的一手资料。

梁启超的华侨史观还反映在《夏威夷游记》^④《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⑤等文。他既关注到华侨华人在海上丝绸之路,特别是大航海时代开启以来活跃于海洋商贸活动曾经创造的辉煌,也对中国逐步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困境过程中华侨华人遭受到的奴役驱使和排斥歧视进行了客观理性的考察。同时,他还在理论上摆脱了仅从中国角度看待这一群体,而且往往是将其视为中外交涉中棘手问题、消极因素的负面认识。在实践中,梁启超及其所代表的维新派势力,通过在海外侨社中锲而不舍地宣传保皇救国、变法图强、君主立宪,以及组织发动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等,对华侨华人进行了首次大规模的思想文化启蒙和政治经济动员,从而形成了在学术上所谓的华侨华人与中国的首个“强关系”时期,为华侨华人在辛亥革命时期掀起第一次爱国高潮,作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四、梁启超的华侨史观对后世相关研究的启发

梁启超的华侨史观对民国时期研究华侨华人问题的一些学者如胡绍南、易本羲、温雄飞等人的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比如《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等著述对于华侨史研究的主要意义更多在于揭示了华侨华人在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全球化早期分布形态中的所作所为。所谓华侨史观就是以华侨华人这个群体本身为视角来考察相关历史发展脉络;所谓全球史观,无疑是对全球化发展脉络,以及对其中各种相互作用力量和相互影响因素的揭示;而所谓区域国别史,可以理解为局部性、分散化的全球史研究,即针对全球史中各个特定地理和历史文化区域的形成而分别进行的考察和研究,或作为个案的国别研究与相关问题探讨,也可以理解为是从地区和国别史出发对全球化发展进程及其差异化表现的考察和研究。华侨史观是可以将中国史、相关区域国别史和全球史联结起来的一个独特视角,也是物质文化史或文明交流史考察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自隋唐开始,以瓷器、丝绸外销为代表,中国的海洋贸易日趋活跃兴盛,至宋元时期形成了以泉州为中心的世界海洋商贸格局。在明朝中叶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前,中国也因而成为“区域”(即地区性)全球化或“接力式”海洋贸易的组织者和主导者。在明清两代,华侨华人也一直是海洋商贸中自发的活跃力量,以及

①《梁启超全集(第四集·论著四)》,第183页。

②《梁启超全集(第十七集·诗文)》,第205—211页。

③《梁启超全集(第十七集·诗文)》,第201—205页。

④《梁启超全集(第十七集·诗文)》,第258—266页。

⑤原载于《新民丛报》第63—64号,1905年2月18日、3月6日出版。参见《梁启超全集(第五集·论著五)》,第57—71页。

封建王朝与东来的西方列强不时周旋于海上的屏障。虽然在晚清“华侨”的概念出现之前,他们通常被冠以“海商”“私人(民间)贸易”“武装海商集团”“走私贸易”“海盗”,乃至“倭乱”等标签,但他们的大规模“契约华工”出洋之前,中国从事海洋跨国活动的主力军。只是由于明清两代封建统治者的闭关保守,以及对于华侨华人前往海外生产和经营活动的严酷打压,中国不仅失去了海洋商贸中的主导地位,更失去了主动迎接和融入工业革命引发的近代全球化的机遇,甚至华侨华人本身也成为海洋贸易中的一项大宗交易——“苦力”(俗称“猪仔”)贸易。因而梁启超将华侨华人作为“独特”群体的开创性研究,对于今日重新审视和探究华侨史起源、华侨华人在早期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作用、自隋唐以后愈发活跃的海洋商贸活动,对于中国朝代兴衰更迭和社会变革的影响和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及货币金融演变的意义,对于中国与近现代世界体系的关系,乃至文明互鉴的推动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进,都是值得再度回顾与思考的。

自明代开始,关于中国人迁徙海外的记载,就不断出现于各种奏折、报告、地方志、游记和小说中,加之荷属东印度殖民政府自1866年开始就有关于华侨华人秘密会社和商业制度的研究专著问世^①,因而在全球史视野下梁启超并非以华侨华人作为对象进行专门考察、记述或研究的第一人,但与其复兴国家民族的思想理念和政治追求相一致的是,他毫无疑问是从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视角,全面审视华侨华人在海外的情形及其对于中国积极意义和作用的第一人。从其流传于世的著述看,梁启超对于华侨华人的研究主要涵盖四个方面:一是对美国排华问题及相关中外交涉的研究,二是对华侨史(缘起)的研究,三是对华侨华人社团组织的研究,四是对华侨华人经济活动的研究。相应地,梁启超也奠定了至今仍是学界继续关注 and 不断探讨的关于华侨华人研究的主要思考方向或选题视角:一是关于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二是关于华侨华人遭遇的排华歧视,三是关于海外侨社自身及华侨华人在当地的发展,四是国际关系中的华侨华人。

“华侨史”研究与“中外交通史”“中外关系史”密切相关,如今被列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一级分类学科“历史学”中的“专门史”,也较多出现于近年来已被纳入区域国别史的“东南亚”研究中。当然,将东南亚研究纳入或升格为国际关系研究,也是此轮区域国别史和全球史研究“热”之前国内多所高校早已出现的院系专业调整。此外,一直有学者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民俗学、宗教学、教育学、语言学、传播学,以及金融学和邮政学等学科或领域开展的华侨华人研究也持续不断地有新成果问世。这一多学科、多视角研究华侨华人的情形,一方面反映出这一群体在历史上确实留下了广泛而鲜明的印迹和影响,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其中蕴含着“独特”的学术价值和多重学术意义。

总之,梁启超关于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正向思考和积极认识的“华侨史观”,一方面主要反映了他对当时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见解,借助华侨华人在东南亚一带已自发形成的人口分布和商贸优势,增强与西方角逐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将中国史观与区域国别史观和全球史观相结合视野。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这对于中国华侨史研究超越仅着眼于华侨华人这一群体本身的事就论事也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梁启超的这一认识,不仅在当时远超朝野官僚士绅,在百余年后的当下,对于从华侨史反观中国史(特别是明清史)、相关区域国别史和全球史(世界史)、文明史或物质文化史,同样不失其学术启发意义和研究探讨价值。

(责任编辑:黄文波)

^①庄国土:《回顾与展望:中国大陆华侨华人研究述评》,《世界民族》2009年第1期。

Main Contents

Research on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Mitig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Staff

.....Fan Juanjuan(3)

Abstract: The global "Chinese language boom" continues to gain momentum, highlighting th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challen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staff. To effectively address thes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several mitigation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strengthening the establishment and support for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training centers to normalize the training of local overseas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developing an evaluation system for overseas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training to enhance precision in training efforts; encouraging domestic universities to "go global" and intensify joint efforts to cultivate local teaching staff; creating a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community to build a shared learning network for teachers and share high-quality resources; and actively promoting overseas teaching programs for "new seniors" to leverage the unique strengths of this group.

Keywords: Overseas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eaching Staff; Practical Challenges; Mitigation Strategies

Wartime Propaganda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Patriotism of Wenzhou's Overseas Chinese-Related Publication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Cai Likun Liu Li (12)

Abstrac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Wenzhou's overseas Chinese-related publication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war effort and disseminating patriotism. An analysis of reports from publications such as Zhe'ou Daily and Wenzhou Daily on overseas Chinese efforts to resist Japan and save the nation reveals that these outlets closely integrated content about overseas Chinese with wartime propaganda, consistently centering on the primary task of "mobilizing for the war of resistance." The extensive dissemination of patriotism among overseas Chinese through these publications inspired a strong sense of patriotism among local citizens, provided great encouragement and morale to people during the war, and served as a vital source of public support contributing to the ultimate victory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Keywords:Anti-Japanese War Period; Wenzhou Overseas Chinese-Related Publications; Propaganda and Mobilization; Overseas Chinese Patriotism

Bridging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Global Historiography through the "Overseas Chines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Brief Review of Liang Qichao's Research on Overseas Chinese

..... Cheng Xi (18)

Abstract: Liang Qichao was a pioneer in the study of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His foundational contributions extend beyond establishing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as a specialized field within Chines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shaping the main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perspectives for studying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that remain relevant today. More importantly, Liang developed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overseas Chinese" centered on the prosper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ational power. He emphasized the role of transnational trade and migration activities by overseas Chinese as a crucial support for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This perspective not only inspired the research approach of tracing the history of overseas Chinese to reflect on the rise and fall of Chinese dynasties since the Sui and Tang periods, specifically by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activities on social transformations, but also it holds significant academic value and potential for expanding research. This includes exploring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history with regional and national histories, global (world)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civilization or material cultural history through the lens of overseas Chinese his-

tory.

Keywords: Liang Qichao;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Global History

"Building Dreams of Peace": The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Merchant Community in Europe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 **Shao Zhengda Cao Yutong (24)**

Abstract:After World War I, the Chinese merchant community in Europe began to emerge, with participants in the war as laborers and postwar "chain migration" forming key sources of this group. During the 20 years of peace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Chinese merchants in Europe managed to establish and develop themselves under extremely challenging conditions. They can be broadly categorized into three types: stationary merchants (sedentary traders), itinerant vendors (mobile traders), and those combining labor and commerce. The Chinese merchant community in Europe during this period exhibited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Their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 heavily reliant on the peaceful environment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They remained on the margins of Europe's mainstream economy and society. They displayed strong patriotism, actively supporting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European war in 1939, the loss of a peaceful environment made it difficult for the Chinese merchant community to sustain their businesses and livelihoods. Many became displaced or returned to China, leading to the rapid decline of the once-thriving Chinese merchant community in Europe.

Keywords:Two World Wars; Chinese Merchants; Europe

An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Malaysian Chinese Entrepreneurs in Empow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 **Chen Chengfeng (34)**

Abstract:Malaysia'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possesses unique advantages, making it an important overseas resou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The strong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the rapid growth of semiconductor trade, and close investment cooperation provid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collaboration in the semiconductor sector. This facilitates industrial integration, business exchanges,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between companies from both countries. Many semiconductor enterprises in Malaysia are predominantly owned and operated by Chinese entrepreneurs. These businesses excel in various segments, including design, manufacturing, and packaging and testing, demonstrating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a wealth of professional talent, and close economic and trade connections with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can leverage its natural ties with Chinese entrepreneurs to encourage them to empowe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through equipment supply, technical support, global expansion, and innovative collaborations.

Keywords:Malaysia; Semiconductor Industry; Chinese Entrepreneurs

Chinese Laborer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rans-Siberian Railway

..... **Zhong Biyuelun Pan Xiaowei (44)**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rans-Siberian Railway faced a significant labor shortage from the outset. The Russian government initially relied on exiles, convicts, and soldiers for railway construction, but these efforts proved ineffective. Given the prior use of Chinese laborers in mining an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the Far East, where their performance earned the approval of employers, the plan to hire Chinese workers for railway construction was implemented. Chinese laborers participated as manual workers, not skilled personnel, primarily undertaking tasks such as earth excavation, logging, and track laying. Large numbers of Chinese laborers were employed in the early sections of the Far Eastern construction zone, such as the Ussuri Railway and the Transbaikal Railway. However, their involve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mur Railway was comparatively limited.

Keywords: Chinese Laborers; Trans-Siberian Railway; Far East Development

An Exploration of the Period of Overseas Migration of People from Yulin in Guangxi

..... **Zheng Yixing (52)**

Abstract: Yulin is the largest overseas Chinese hometown in Guangxi. The migration of people from Yulin to overseas destinat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main periods: the early stage of migration, the first peak period, the second peak period, and the normal migration period. The reasons for migration among Yulin people are varied, including social unrest, the "selling of piglets"